

万 斌 主 编

吴光 滕复 副主编

浙学研究

集 萃

891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万 斌 主 编

吴光 滕复 副主编

浙学研究

集萃

上海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浙学研究集萃/万斌主编.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5. 1

ISBN 7-5325-3991-1

I. 浙... II. 万... III. 哲学学派—研究—浙江省
—汉代~近代 IV. B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131732 号

浙学研究集萃

万 斌 主编

世纪出版集团 出版、发行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邮政编码 200020)

(1) 网址: www.guji.com.cn

(2) E-mail: guji1@guji.com.cn

(3) 易文网网址: www.ewen.cc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经销 江苏启东人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50 × 1156 1/32 印张 13.125 插页 2 字数 317,000

2005 年 1 月第 1 版 200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100

ISBN 7-5325-3991-1

B · 482 定价: 38.00 元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公司联系 0513—3349365

“浙学”的内涵与外延(序一)

吴 光

浙学,简单地说,就是浙江地区的学术文化,或曰浙江特色的学术传统。然而作为一个独特的学术理论概念,一个专用学术名词,就不能这么简单地理解了。从一般意义而言,所谓“浙学”,应是对发生发展于浙江、形成了浙江特色而其影响波及于国内外的一种学术文化传统的理论概括,它代表着一种富有地方特色的人文传统与理性精神。

关于“浙学”的理论内涵,从这个概念最初提出至今,学者们就有异同之见,没有一个公认的、统一的定义。即便是在称谓上,也是众说纷纭:有直称“浙学”的,有以“浙东学派”、“浙东学术”代替或等同于“浙学”的,也有视“浙学”为“浙东之学”与“浙西之学”之合称的。因此,很有必要对“浙学”概念的来龙去脉作一番历史的梳理,进而对“浙学”的内涵与外延作出理论的疏解。

据我所知,最早提出“浙学”概念并加以理论界定的是南宋大儒朱熹。他统称永嘉(陈傅良、叶适)、永康(陈亮)之学为“浙学”,并严加批评,说:

陆氏之学虽是偏,尚是要去做个人。若永嘉、永康之说,大不成学问。(1)

又说:

江西之学(指陆氏心学)只是禅,浙学却专言功利。禅学,后来学者摸索一上,无可摸索,自会转去。若功利,则学者习之便可见效,此意甚可忧。(2)

可见,朱熹是将“浙学”视为“专言功利”、误导学者的“异端”而加以批判的。

到明清之际的黄宗羲,则比较理性地意识到了“浙东学派”的存在并对其学术传统有所总结。他在《移史馆论不宜立理学传书》一文中首次使用了“浙东学派”一词,批评当时明史馆负责制定《修史条例》的人“其言浙东学派最多流弊”,并把姚江之学和蕺山之学归入浙东学统。黄氏还于崇祯年间汇编了一部集数十名浙东学者著作于一编的《东浙文统》若干卷。(3)但黄宗羲所谓学派,指的是学术脉络,并非现代意义的学派,他对“浙东学派”的理论内涵也未作出明确界定。

黄宗羲之后,首先是全祖望对“浙学”、其次是章学诚对“浙东、浙西”之学作了更明确的理论总结。对此,我在1993年应邀访问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时发表的演讲稿《试论“浙学”的基本精神——兼谈“浙学”与“浙东学派”的研究现状》(文见本书)已作考述。拙论指出:

全祖望所撰《宋元学案叙录》曾多次使用“浙学”一词概

括浙江学者的学术源流、特色和风格……全祖望所谓的“浙学”，是相对于濂、洛、关、闽之学而言的南宋浙江儒学，其范围涵盖了当时浙东地区的永嘉、金华、四明诸子之学。“浙学”诸子的思想倾向……往往具有一种“和齐斟酌，折衷朱陆”的学术风格……继全祖望之后，清乾嘉时代的史学家章学诚在《浙东学术》一文中首次作出了“浙东之学”与“浙西之学”的区分，并分析了各自的学术渊源和学派特色。从章氏所述浙东之学的源流与特色来看，浙东学术的主流是从南宋四明学派、中经明代姚江学派（即阳明学派）到明清之际的蕺山—梨洲学派，其特色是“宗陆（王）而不悖于朱”。值得重视的是，章学诚所讲的“浙东学术”，并非单指史学，而是涵括了宋明理学、心学的“经史之学”。

在总结梳理前人有关“浙学”论述的基础上，我对“浙学”下了个初步定义：

所谓“浙学”，即发轫于北宋、形成于南宋而兴盛于明清的浙东经史之学。它并非单一的学术思潮，也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学术流派，而是内含多种学术思想、多个学术派别的多元并存的学术群体——在“浙学”内部，既有宗奉程朱的理学派，也有宗奉陆王的心学派，还有独立于理学、心学之外的事功学派。然而，这个学术群体内部的各家各派，在相互关系上并不是绝对排他、唯我独尊的，而是具有兼容并蓄、和齐同光的风格，从而体现了某种共同的文化精神——浙学精神。

现在检讨起来，我的这个定义重视了“浙学”的主流——浙

东学派与浙东学术的发展演变及其特色,大体上可以成立,但还是相当粗糙而且有片面性的。之所以说它粗糙且有片面性,是因为对章氏《浙东学术》中所说“故浙东、浙西,道并行而不悖也”(《文史通义》内篇卷五)一语未予足够的重视,忽略了“浙西之学”在“浙学”中应占有的地位。

况且,历史是不断发展进步的,学术史及其学术概念的涵义也是与时俱进、不断充实以适应时代要求的新内容的,“浙学”的概念也是如此。如果说,宋元学者眼中的“浙学”仅限于金华、温州地区的“婺学”与“永嘉、永康之学”的话,那么明末清初的黄宗羲、全祖望已经将“浙学”的领域延伸到宁波、绍兴等大浙东地区,而且所包含的学术流派也不限于“婺学”与“永嘉、永康之学”,而且包括了“庆历五先生”、“甬上四先生”(即所谓“四明学派”或“明州学派”)以及姚江学派与蕺山学派了。及至清代乾嘉时期的章学诚,则在《浙东学术》这篇名著中对“浙西之学”与“浙东之学”作了明确区分,强调“浙东、浙西,道并行而不悖”的特色,这实际上已是大“浙学”的观念了。

自章学诚以后,近现代以至当代的许多学者,从章炳麟、梁启超、钱穆、何炳松、姚名达、陈训慈到陈荣捷、刘述先、金毓黻、杜维运、余英时、何冠彪、古清美、詹海云、郑吉雄,以及当代浙江籍的众多学者(如北京的方立天、张立文、陈来、张义德,上海的冯契、谭其骧、潘富恩、罗义俊,南京的洪焕椿,杭州的仓修良、王凤贤、魏桥、吴光、董平、滕复、钱明、何俊、杨际开,宁波的方祖猷、管敏义、季学源,金华的方如金,温州的周梦江等等),都发表过有影响的学术论著,从各个角度研讨、评论“浙学”或“浙东学派”、“浙东学术”的理论内涵、历史沿革、学派脉络、思想特色、精神特质、研究成果等问题,从而把对“浙学”的研究推向了一个“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新阶段。

限于篇幅,本文无法一一罗列各家论“浙学”的理论观点与学术成就,而试图站在当今时代背景下对“浙学”的内涵作一重新审视,申明并强调我们关于“浙学”的基本观点。我们认为:

首先,关于“浙学”的内涵,应该作狭义、中义与广义的区分。狭义的“浙学”概念是指发端于北宋、形成于南宋永嘉、永康地区的以陈傅良、叶适、陈亮为代表的浙东事功之学;中义的“浙学”概念是指渊源于东汉、酝酿形成于两宋、转型于明代、发扬光大于清代的浙东经史之学,包括东汉会稽王充的“实事疾妄”之学、两宋金华之学、永嘉之学、永康之学、四明之学以及明代王阳明心学、刘蕺山慎独之学和清代以黄宗羲、万斯同、全祖望为代表的浙东经史之学;广义的“浙学”概念即“大浙学”概念,指的是渊源于古越、繁荣兴盛于宋元明清而绵延泽惠于现当代的浙江学术思想传统与人文精神传统。这个“大浙学”,是狭义“浙学”与中义“浙学”概念的外延,既包括浙东之学,也包括浙西之学;既包括浙江的儒学与经学传统,也包括浙江的佛学、道学、文学、史学、方志学等人文社会科学传统,甚至在一定意义上涵盖了有浙江特色的自然科学(如农学、医学、地理学、天文历算学等)传统。当然,“大浙学”的主流,仍然是南宋以来的浙东经史之学。

其次,关于“浙学”的历史一贯性与学派统一性的问题。即“浙学”是否一个古往今来一脉相承的学术派别?是否有一个前后一以贯之的学术宗旨?是否有一种共同的学术风格与文化精神?对此,学者们的观点颇有歧异,有的认为“浙学”内部虽然存在多个不同的学术派别和异见纷呈的思想宗旨,但却异中有同,即存在某种共同的文化精神或人文精神;有的只承认南宋浙东学派而不承认清代浙东学派,有的认为存在着两个或多个学派独立、宗旨各异的浙东学派;有的认为浙东学派是南宋时确立并传播、流行于大浙东地区的一个道学或理学思想流派。我个人

比较坚持前一种见解,即认为无论是“浙学”还是“浙东学派”,都并非是一个单一学派的连续性发展,而是多个学派“和齐斟酌,多元共存,互相融通”而形成的学术格局。而在经历千百年的学术磨合过程中,逐渐形成了“浙学”各派共同具有的、以“明道计功、正义谋利、经世致用”为特色的浙江人文精神。这种人文精神是从王充到陈亮、叶适、王阳明、黄宗羲、章学诚以至近现代的龚自珍、章太炎、鲁迅、蔡元培、马一浮等著名浙江思想家都一致认同并且以不同语言予以阐扬的浙江文化精神。

第三,关于“浙学”精神的思想要素与基本内容。我们既然把“浙学”作为一个独特的学术理论概念和专有名词去使用,就应当承认“浙学”并不是一个学术大杂烩,而是具有某种共同文化精神的学术传统与思想传统。那么,“浙学”精神的思想要素及其基本内容是什么?这是需要认真研究的课题。我在《试论“浙学”的基本精神》文中将“浙学”精神概括为“求实精神、批判精神、兼容精神、创新精神”,又在《论浙江的人文精神传统及其在现代化中的作用》一文中从五个方面概述浙学人文精神的主要内容,即:“一、‘天人合一,万物一体’的整体和谐精神;二、‘实事求是,破除迷信’的批判求实精神;三、‘经世致用’的实学精神;四、‘工商为本’的人文精神;五、‘教育优先、人才第一’的文化精神”(文见本书)。滕复先生在前几年曾参与有关“浙江精神”的课题研究,认为“实事求是、海纳百川、自得创新、开拓进取,这不仅仅是浙学的基本精神,而且也是浙江历史文化的精精神,是浙江人的精神”(见本书“序二”)。杨太辛先生在《永嘉学派的学术宗旨》中所归纳的永嘉学派“学术精神”的基本要素是:“学有统绪,体常尽变;学有宗旨,不守门户;学有创发,不因陈见;实学求是,经世致用;严于去伪,慎于纠偏;砥砺气节,躬行实践”(4),董平先生在其《浙江精神的哲学本源》一书(浙江古籍出

版社 2004 年 4 月版)的《绪言》中,认为“浙东学派”的“本质精神”乃“在于它以经史研究为手段的对于大道的追索与体究,在于它关于历史的哲学诠释以及哲学的历史追寻”。凡此种种对“浙学”精神内涵的探索与概括,虽然有待于完善与深化,但对后来者应是有所启迪的。

关于浙东、浙西之学的异同。不少学者谈论浙学时,往往只论及浙东之学而不论浙西之学,在对浙东、浙西之学作比较研究时又只见其异而不见其同,甚至有人根据章学诚“浙西尚博雅,浙东贵专家”一语而得出“浙西重经学,浙东重史学”的结论,从而将浙东、浙西之学对立起来。我认为这是一种偏见。其实,在章学诚之前,全祖望的“浙学”概念中虽以浙东为主,但已涵盖了浙西之学。如其《宋元学案·士刘诸儒学案叙录》称:“庆历之际,学统四起……浙东则有明州杨、杜五子,永嘉之儒志、经行二子,浙西则有杭之吴存仁,皆与安定湖学相应”,可见在全祖望看来,北宋的浙东、浙西之学是互相呼应的。章学诚虽有“尚博雅,贵专家”之说,但他同时也赞赏双方学者不持门户之见、“互相推服而不相非诋”的宽容态度,并强调了“浙东、浙西,道并行而不悖”(《论浙东学术》)的学术风格。而在近现代浙江学术思想史上,浙东、浙西之学更有相互融通之势,尤其是在省会杭州更是如此。如出身浙西杭州府的龚自珍、章太炎,其实堪称浙东学风的继承者与弘扬者。对此,当代浙西籍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早有所见。他在 1947 年 4 月 5 日发表于《浙大校刊》的论文《近代杭州的学风》中指出:“杭州于浙西已属边缘地带,隔钱塘江与浙东学术中心的宁绍相接,故其学风虽以浙西为素地,同时又深受浙东的影响,实际上可说是两浙学术的一个混合体。由混合而融化,迨其融化而后,遂自成一型,既非浙东,亦非浙西。”这是颇为中肯的意见。这对我们在当代坚持“广义浙学”的研究方向也是

一个很好的启示。

我们浙江省社会科学院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建院伊始,就以“浙学”研究为学科建设的重点之一。20多年来,先后由本院发起主办了以“宋明理学”、“黄宗羲”、“王阳明”、“马一浮”、“浙学学术”、“当代儒学”为主题的大型国际学术会议。本院学者陆续进行了“黄宗羲与浙东学派研究”、“阳明学系列研究”、“浙江思想文化史研究”、“浙江学派系列研究”等国家级重点课题和省级重大或重点课题的研究,完成了《黄宗羲全集》、《王阳明全集》、《刘宗周全集》等大型古籍整理计划,撰著出版了20余部与“浙学”主题相关的思想文化史专著,主编出版了10余部专题论文集和译著,还发表了300余篇专题学术论文。可以说,我院学者在“浙学研究”领域,无论在本省还是在全国,都是居于领先地位并有学科优势的,我们的工作与研究成果,也获得了国内外学界同仁的好评。

为了进一步推动“浙学研究”的深入开展,也为了保存本专题研究的历史资料,我们哲学所同仁在万斌院长主持下,从本院学者已发表的数百篇论文中精选20余篇,并附《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学者“浙学”研究论著索引》1篇,汇为一册,题名《浙学研究集萃》,交付出版,以资读者研究参考。

需要说明的是,限于版面,本书所选论文,只是部分地反映了本院学者的研究成果,而重点仍在南宋、明清的浙东之学。将来如有机会,我们希望能再编印一册以浙西之学研究成果为主的续集。至于所论是耶,非耶?则欢迎专家批评指教。是为序。

写于2004年10月6日

注释:

- (1)《朱子语类》卷一百二十二,《吕伯恭》,中华书局1994年3月版王

星贤点校本第八册,页 2957。

(2) 同上,卷一百二十三,《陈君举》,页 2967。

(3) 参见拙著《黄宗羲著作汇考》,台北,学生书局 1990 年版第 244 页。

(4) 杨太辛文载《叶适与永嘉学派论集》,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 2000 年 12 月版,页 511。

浙学传统与浙江精神(序二)

滕 复

—

浙江古称“越”，文化的历史悠久和繁荣，为中华古老文明的发祥地之一，素有“文物之邦”的美名。根据考古的资料证明，浙江早在十万年前就已经有文明的曙光出现；五万年前，“建德人”就已经在浙西的山地密林中生活，他们靠渔猎为生，并且已经能够使用火；两万年前到八千年前，随着海侵的进退，“建德人”曾相继在太湖平原、杭嘉湖平原和宁绍平原生存并建立起文明的聚落。这是越民族最早的祖先。根据新中国考古对河姆渡、马家浜、罗家角等地的发掘推断，大约在七千年前，越民族受海侵的影响，一部分在河姆渡、马家浜、罗家角等地势高燥处定居，其生产也已经由渔猎转为稻作农业。另有一部分则顺着季风、沿着海流，向日本列岛和南洋群岛等地迁徙。这就是后来《越绝书》中所述到的“内越”和“外越”的由来。事实上，越族由于数千年的不断向外迁徙，包括了中国南方在内的整个东亚和南亚，都

留有越族人开拓进取的痕迹,并且受到古越文化的深深影响。

越民族在数千年的历史进程中,面对恶劣的生存环境,筚路蓝缕,艰苦奋斗,不仅将浙江建设成为一方沃土、“鱼米之乡”,而且创造了极其丰富灿烂的文化和思想。历史上从先秦开始一直到近代,无数杰出的文人、学者以及思想家、政治家不断地涌现出来,他们在思想、学术和文化上的创造的贡献,一方面随着历史的演进,逐渐形成了极具特色的“浙学”及其传统;另一方面也不断展现和丰富了浙江固有的文化精神,而这一切都是同浙江悠久的历史积淀和丰厚的文化土壤分不开的。

二

浙江自古以来文人辈出,学术、思想与文化鼎盛。如先秦时期有计倪、范蠡等著名的思想家和政治家,他们在中国的思想史上最早提出了关于农商具利的思想;汉唐时期有王充的“疾虚妄”重实际的哲学,有魏伯阳、葛洪对于道教理论的贡献,有佛教天台宗的创立以及他们对于佛教中国化的创造,有著名的史学家赵晔和开创了方志学的袁康、吴平,以及有“书圣”王羲之和天才诗人谢灵运等;宋元明清时期更是群星灿烂,思想文化与学术走向空前的繁荣,不仅在思想领域产生了陈亮、叶适、吕祖谦、王阳明、刘宗周、龚自珍等一大批著名的思想家以及永嘉、永康事功学、金华婺学和王阳明心学等众多的思想流派,而且在史学、文学、科学的许多的领域,也涌现出像黄宗羲、陆游、沈括等众多不朽的大家。近代以来浙江的文化学术其繁荣的势头未有丝毫的减退,不仅在文化上有王国维、鲁迅这样百年不出、开一代风气的伟大人物,而且在新经学、新史学、新文学、新儒学、新佛学、

新教育等几乎所有的学术领域,都有开创性的人物和思想文化流派出现。其中著名的人物如孙诒让、蔡元培、章太炎、马一浮、矛盾、太虚等等,他们不仅是浙江地方的大家,是“浙学”的重要代表,同时也各自站在了中国文化的最高处,成为中国文化极有代表性的一群。

“浙学”虽然说是历史悠久、群星荟萃,异彩纷呈,每个时代的学者、学派都有自己独到的学术成就和思想文化上的创造,但是,纵观整个浙学学术的历史、尤其是其中表现出来的学术思想,可以看出前后有着深厚的渊源,是一脉相承的,历史上的浙学在其丰富性和多样性的背后,往往体现出文化价值和思想观念的前后相似性乃至一致性,呈现为共同的思想精神。

那么,浙学的传统到底具备了哪些方面的基本的思想精神呢?

我认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 实事求是

浙学的思想一向注重实际,主张实事求是。学术上讲究经世致用,思想上反对空言说教,主张尊重客观的规律,要求学问与社会的实践、百姓的生产和生活紧密结合起来。如先秦时期的范蠡和计倪的思想,《越绝书》里曾记载越王勾践与范蠡和计倪的问对。当时越王问是否可以攻吴。范蠡回答的是应该首先把握天地、日月、星辰、四时的盈缩之机,关注各国实力的消长,顺势而为,与时俱进,不可逆势而动;计倪的回答是要看国家和百姓的粮食储备如何,并且提出应该实行“农末(商)俱利”的政策,让农民和商人实现双赢,共同获利。认为这样才能够提高农业的生产并搞活市场,从而达到“国富兵强”的目的。范蠡、计倪的答问充分体现了注重实际、尊重客观、实事求是的思想,对后世的影响很大。汉代王充批判天人感应的神秘空洞的说教,主张凡事应讲“证验”和“实效”;宋代陈亮、叶适的事功学主张“事

上理会,步步着实”,讲求实事、事功,开物成务,主张关心百姓日用和国家社稷,以及对朱熹理学忽视功利、专尚义理,只教学者空谈性命、“穷理修身,学取圣贤事业”的批判;舒璘、沈焕等四明心学“所论常平、茶盐、保长、义仓、荒政,皆凿凿可见之行事,而言学者寡”注重学术的社会功用和目的的思想;以及王阳明的主张知行合一,反对“冥行妄作”或“悬空思索”,陈确的“天理正从人欲中见”,章学诚的“史学所以经世,固非空言著述”等主张,包括整个宋元明清的浙江思想家和学派所表现出来的思想上的鲜明的“经世致用”特色,都无不充分体现了自先秦以来就已经有深厚积蕴的实事求是的浙江精神和思想。特别要指出的是,先秦计倪所阐发的“农末俱利”的思想,后来演变为陈亮的“义利双行”、黄宗羲的“工商皆本”的思想,对于冲破儒家思想中的重农轻商、重义轻利的迂腐的价值观,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2. 海纳百川的精神

浙江学术自古善于兼采众家之长,海纳百川,他山攻错。浙东学术本来就是在博采中原关、尹、濂、洛之学的基础上,根据浙江社会以及思想文化的实际,经过思想的融合、创新而形成的学问。我们从吕祖谦、黄震和王阳明的思想和态度上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这种精神。如全祖望曾评价吕祖谦的学问说:“宋乾、淳以后,学派分而为三:朱学也,吕学也,陆学也。三家同时,皆不甚合。朱学以格物致知,陆学以明心,吕学则兼取其长,而复以中原文献之统润色之。门庭路径虽别,要其归于圣人则一也。”(《宋元学案》卷五十一《东莱学案·案语》)他在评价黄震的学术态度时又曾说:“慈湖之学宗陆,东发之学宗朱,门户截然,故《日钞》颇不以心学为是。由今考之,则东发尝与杜洲之讲会,面其后别为一家者也。夫门户之病,最足锢人,圣贤所重在实践,不在诃说,故东发虽诋心学,而所上史馆札子,未尝不服慈湖为己之功。然则杜

洲祠祭,其仍推东发者,盖亦以他山之石,是可以见前辈之异而同也。”王阳明学问上的最大成就,就是对宋代以来的朱熹理学和陆九渊心学思想之间的分歧和争论作出了深刻的总结:“范围朱、陆而进退之”,“融尽其高明卓绝之见而底于实地”(黄宗羲《明儒学案·师说》),将浙东的事功学与心学融为一炉,并立足于“实地”,形成了他自家的思想,因而受到黄宗羲的极力推崇,认为他是自孟子以来能够扫清思想界迷雾的第一人。

浙学思想上的兼收并蓄并非是生吞活剥,而是去除门户之见,有所取舍。更重要的是“重在实践”。一切从实践出发,理论最终要经过实践的检验和印证。

3. 自得创新的精神

浙学思想上强调学术的主体性,强调创新,主张学问贵在“自得”(王阳明语),成一家之言。王阳明在批评陆九渊的心学思想时指出,陆九渊的思想虽然颇得《易》系辞“易简”之宗旨,但是在一些问题(如知行关系)上,仍然有“沿袭之累”,与程朱理学纠缠不清,不能够做到完全的“自得”。相反,王阳明的心学思想比陆九渊的心学思想有着更加广泛的思想来源,但是他从自身出发,尊重自己的“性之所觉”,着眼于“事上工夫”,最终将它的学问和思想提升到超越朱、陆的高度。吕祖谦曾鼓励门人弟子不要蹈袭旧说,一定要跳出前人的窠臼。他在《丽泽讲义》中说:“今之为学者,自初至长多随所习熟者为之,皆不出窠臼;惟出窠臼外,然后有功。”

讲究学问的“自得”,不仅要超越他人,而且要超越时代。马一浮中年以后返归儒学,他在思想上对于宋明儒学态度虽然更多的偏爱王阳明,但是他始终认为一个现代的学者在面对儒学时,正确的态度是“不分古今、不分汉宋、不分朱陆”。讲究自得的实质就是创新,而创新的动力和思想火花则同样来自实践,是